

澳門回歸前後居民語言使用與多語能力研究

閻 喜*

一、引言

葡萄牙人在 16 世紀中葉入居澳門，並在 19 世紀中期採取一系列措施使澳門逐步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¹ 198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簡稱《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標誌着澳門進入了回歸前的過渡時期，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澳門回歸祖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誕生，標誌着澳門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澳門回歸前後二十年裏，澳門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方面，殖民時期的總督制已經被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制代替；經濟方面，澳門回歸之前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處於低谷，而回歸後隨着 2002 年賭權的放開²，澳門的經濟進入了跳躍式發展的新階段；教育方面，回歸前澳門總體文化水平不高，而回歸後澳門的教育得到快速的發展，澳門政府全面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使澳門成為全亞洲首個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的地區，2011 年澳門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年齡在 15 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達到 95.6%³；在語言方面，隨着 1991 年中文在澳門官方地位的確立，中文在澳門具有同葡文同等的法律地位。《澳門基本法》第 9 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進一步確定了中文和葡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

澳門回歸前後澳門人口的日常常用語言使用和多語能力有哪些特點？哪些原因影響澳門人口的語言使用和多語能力？這些特點對澳門今後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提出哪些挑戰？本文通過對澳門回歸前後二十年裏所進行的五次人口普查中有關澳門人口日常常用語言使用和多語能力情況的調查結果進行分析，探尋澳門回歸前後語言使用和多語能力的變

化特點和發展趨勢，並分析這些特點和發展趨勢對澳門今後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提出的挑戰。希望本研究能夠吸引更多的學者關注澳門的社會語言現象，推動澳門社會語言學的進一步研究與發展。

二、澳門回歸前後語言使用和語言能力狀況

Nortier 認為雙語與多語研究可以借助宏觀層次的人口普查和樣本調查，中間層次的問卷調查，以及微觀層面的觀察法。⁴ 許多學者都利用宏觀層次的人口普查對多語現象進行研究。⁵

表 1 澳門居住人口日常常用語言一覽(單位：%)

項目 \ 年份	1991	1996	2001	2006	2011
廣東話	85.8	87.1	87.9	85.7	83.3
普通話	1.2	1.2	1.6	3.2	5.0
其他中國方言	9.6	7.8	7.6	6.7	5.7
葡語	1.8	1.8	0.7	0.6	0.7
英語	0.5	0.8	0.7	1.5	2.3
其他	1.1	1.3	1.7	2.3	3.0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局：《2001 人口普查總體結果》、《200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2011 人口普查詳細結果》。

表 1 是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發布的最近五次人口普查中有關澳門人口家庭常用語言所佔比例繪製而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澳門人口是指慣常在澳門居住的人士，包括常住人口及流動人口，它不等同於澳門居民。⁶ 從該表我們可以看出澳門人口在日常常用語言使用方面有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廣東話作為澳門人口日常常用語言所佔比例始終居於首位，保持在 80% 以上。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澳門回歸以後廣東話所佔的比

*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英文系博士研究生

例呈現下降的趨勢，由 2001 年的 87.9% 下降到 2006 年的 85.7% 和 2011 年的 83.3%。

其次，普通話作為澳門人口日常常用語言使用的情況發生了較為明顯的變化，回歸前普通話所佔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1.2%，而回歸後普通話所佔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由 2001 年的 1.6% 上升到 2006 年的 3.2% 和 2011 年的 5.0%，超過了葡萄牙語所佔的比重，並逐步接近其他中國方言所佔的比重。

第三，回歸前後葡萄牙語在澳門作為日常生活常用語言所佔的比例一直較低。回歸前葡萄牙語所佔的比重一直維持在 1.8%，雖然較低，但是仍然高於普通話、英語和其他語言所佔的比例。而回歸初期葡萄牙語所佔的比重則降到 0.7%。從最近三次的人口普查結果看，葡萄牙語作為澳門人口日常常用語言的比例一直維持在 0.7% 左右，低於普通話、英語和其他語言所佔的比例。

第四，英語在回歸前作為澳門人口日常生活常用語言所佔的比例呈現上升的趨勢，從 1991 年的 0.5% 上升到 1996 年的 0.8%。雖然英語在澳門回歸初期所佔比例有所下降(0.7%)，但是最近兩次的人口普查顯示英語作為澳門人口日常常用語言所佔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從 2001 年的 0.7% 上升到 2006 年的 1.5% 和 2011 年的 2.3%，超過了葡萄牙語。

第五，其他的中國方言(包括福建話在內)作為澳門日常生活常用語言所佔的比例一直下降，已由 1991 年的 9.6% 下降到 2011 年的 5.7%。與此同時，其他外國語言所佔的比例卻一直在增加，從 1991 年的 1.1% 上升到 2011 年的 3.0%。

總的來說，澳門回歸前日常常用語言中廣東話佔主導地位，其他中國方言、葡萄牙語、普通話和英語分列第二、三、四、五位。回歸後澳門人口日常生活常用語言格局有所變化，雖然廣東話仍然佔主導地位，但是其所佔比例有所下降，葡萄牙語退居第五位，而普通話和英語後來居上，位居第三和第四位。

表 2 是根據過去二十年裏人口普查中有關澳門人口多語能力的調查結果繪制而成的。需要指出的是，由於《91 年澳門人口普查》和《2011 年人口普查詳細結果》並沒有明確列出多語能力調查結果的相關數據，所以在表 2 中只統計了 1996 年、2001 年和 2006 年的相關數據。此外，1996 年中期普查多語能力的問題詢問人們能夠使用四種和四種以上語言的能力，而 2001 年和 2006 年的調查中沒有涉及能夠使用四種以上語言的問題。所以表 2 中 1996 年可操四種語言的人包括能說四種或者更多語言的人。

表 2 澳門人口多語能力一覽(單位：%)

項目 \ 年份	1996	2001	2006
可操一種語言的人	63.30	55.83	46.01
可操兩種語言的人	27.39	30.60	37.11
可操三種語言的人	8.07	11.79	15.11
可操四種語言的人	1.23	1.79	1.77

資料來源：統計暨普查司：《9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2001 年人口普查總體結果》、《2006 中期人口統計總體結果》。

從表 2 我們可以發現，1996 年可操一種語言的人所佔的比例是 63.30%，而這一比例在 2001 年下降到 55.83%，說明回歸初期的澳門基本上還是一個大多數人口只會說一種語言的社會。但是這一比例在 2006 年進一步下降到 46.01%，其下降幅度大於 1996 年到 2001 年的下降幅度。與此同時，可操兩種語言的人所佔比例從 1996 年的 27.39% 上升到 2006 年的 37.11%，增加了差不多 10%。能說三種語言的人所佔比例從 1996 年的 8.07% 上升到 2006 年的 15.11%，增幅達 7%。此外，我們發現可操兩種和三種語言的人所佔比例 2001 年到 2006 年的增幅大於 1996 年到 2001 年的增幅。至於可操四種語言的人的情況，表 2 顯示過去二十年來澳門可操四種語言的人所佔比例一直在 2% 以下，雖然這一比例一直在緩慢增長。

三、澳門的語言發展趨勢

我們通過對過去二十年裏澳門五次人口普查中有關澳門人口日常常用語言和多語能力的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發現回歸前後廣東話一直佔有很高的比例，不過其所佔比例呈現下降的趨勢；普通話和英語的比例在回歸前低於葡萄牙語，但是在回歸後的十來年裏一直保持上升的趨勢，並都超過了葡萄牙語所佔的比例；葡萄牙語的比例在回歸前相對穩定，回歸初期出現明顯的下降，但之後則相對穩定；其他中國方言在過去二十年裏所佔比例整體上一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其他外國語言則一直呈上升趨勢。下面我們簡要分析影響澳門人口日常常用語言的原因。

廣東話在澳門人口日常生活中作為常用語言所佔的比重一直較高。這是因為澳門處於粵方言區，有很多人以廣東話為母語，澳門在回歸之前與內地相對隔絕，因而內地推廣普通話的運動並沒有對澳門產生較大的影響，廣東話得以在澳門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澳門回歸以後，廣東話逐漸擴展在澳門各個領

域裏的使用範圍。在行政領域，廣東話成為常用的工作語言，從政治選舉，到立法會會議，都能聽到廣東話的聲音；在教育領域，雖然官方學校主要使用葡萄牙語，但是澳門絕大多數學校都是華人學校，主要使用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在經濟領域，隨着個人自助遊的推行，大批內地遊客來到澳門娛樂旅遊，進一步提升了廣東話在澳門的地位；在傳媒方面，人們一般收聽收看本地廣東話節目，由於澳門與香港相鄰，澳門人還可以較為容易地收看收聽香港的廣東話廣播電視節目。綜上所述，澳門回歸以後，澳門廣東話的使用範圍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教育領域、傳媒領域等，都有廣東話的影響，這都有助於維持廣東話在日常生活中作為常用語言的地位。但是回歸後大批內地移民、外地僱員、內地學生以及外國人士來澳定居、工作、或是求學，由於其中有很多人不懂廣東話，使得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他們之前常用的語言或是一些使用範圍較廣的語言(如普通話和英語)，因而廣東話所佔比例出現下降。

普通話在澳門人口日常生活中所佔的比例呈大幅上升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回歸後大量內地移民和外地僱員來澳門定居和工作，由於其中有很多人不懂廣東話，他們傾向於使用普通話。與此同時，能說普通話的澳門人所佔比例也呈大幅上升的趨勢，2011年人口普查結果顯示，41.4%的澳門人口能夠講普通話⁷，表明普通話在澳門的普及程度較高。閻喜分析了澳門回歸後普通話普及程度的原因⁸，他認為對祖國認同是普通話推廣的基礎和關鍵，澳門社會經濟城市快速發展推動全社會推廣普通話，移民對普通話在澳門使用比例的增加也有一定的影響，此外，廣東地區語言變遷的影響，澳門學者進行大量的普通話教學，研究與測試以及教材編寫的工作和澳門高等院校的都對普通話的普及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澳門中小學有關普通話的教學在推動普及普通話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葡萄牙語在澳門人口日常生活常用語言中所佔的比例一直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這與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方式和殖民政策有關。Shan and Leong認為澳葡殖民政府一直將澳門華人視為外國人，並沒有考慮負責澳門華人的教育問題(包括葡萄牙語教育)⁹，所以澳葡政府在殖民時期並沒有向澳門華人強制推行葡萄牙語。長期以來，澳門華人都是在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接受教育，而這種教育通常是以中文為授課語言。¹⁰ 另一方面，這與葡萄牙語的國際地位有關，與

英語相比，葡萄牙語在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使用範圍有限，這也使得很多澳門人傾向於讓子女學習英語而不是葡萄牙語。但是我們也注意到能說葡萄牙語的人比日常生活使用葡萄牙語的人多，這可能是由於葡萄牙語仍然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正式語文，有很多人希望通過學習葡萄牙語進入政府部門工作，此外，有很多來澳工作或者學習的外國人士除了自己母語外，也都會說葡萄牙語。

英語在澳門日常生活中作為常用語言的比例以及澳門人會說英語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這與英語在澳門各個領域的廣泛使用不無關係。早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Harrison 已經注意到英語在澳門的重要作用 and 地位，並強調了英語對於澳門的現代化和過去十年來的發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認為英語是澳門第二種最有用的語言，僅次於粵語。¹¹ Mann and Wong 則認為英語在澳門不僅是一種額外的語言和廣泛溝通的語言，而且是一種族際通用語言。¹² 隨着《中葡聯合聲明》在 1987 年的簽訂，澳門進入了回歸的過渡期。雖然過渡時期人們關注的焦點是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但是這並沒有影響英語在澳門的進一步擴大它的影響。澳門回歸以後，隨着賭權的放開，美國資本的引進，澳門博彩業、旅遊業以及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英語的重要性進一步體現出來。Young 使用問卷調查了澳門一所高校裏 144 名澳門本地大學生和 197 名內地來澳讀書的大學生對於英語的態度，研究發現兩組學生都充分意識到英語對澳門和他們自己的重要性。¹³

現在英語在澳門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治領域，Moody 的研究發現澳門政府許多部門的網頁都設有英文網頁。¹⁴ 此外，澳門每年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來澳門定居或是工作，也有許多學生來澳門求學，他們與澳門各個政府部門交流的語言通常是英語。在經濟領域，澳門每天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英語自然成為澳門接待這些遊客的重要工具。同時，澳門會展業也迅速發展¹⁵，每年舉辦各種國際性會展，英語通常成為國際性會展的工作語言。在教育領域，英語的重要性更加明顯，《教育調查 2010/2011》顯示目前澳門以中文為授課語言的學校有 88 所，以英文為授課語言的學校有 14 所，以葡文為授課語言的學校有 4 所。¹⁶ 雖然中文學校在澳門教育體制中佔主導地位，但是大部分學校都把英語設立為第二語言，許多學校還分為中文部和英文部。在法律領域，一些法律文件也已經被翻譯成英文。英語已經成為澳

門政府“事實上的”正式語文¹⁷，在澳門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各個領域廣泛使用。¹⁸

總的來說其他中國方言在澳門日常語言所佔比例較低。原因可能是新來澳門的內地移民來自非粵語區，他們還沒有掌握廣東話，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會用原來的方言，但是由於這些其他漢語方言在澳門的適用範圍及其有限，這些家庭可能會逐漸轉向廣東話和普通話。¹⁹ 而其他外國語言在澳門的日常生活所佔比重以及能夠使用這些語言的人都不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很多外國人來澳門尋求發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自己的母語，而非英語。

四、澳門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

我們通過對澳門人口日常生活常用語言和多語能力的分析可以看出：澳門社會是一個多語社會。廣東話、普通話、葡萄牙語、英語、以及其他中國方言和外國語言在澳門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各自使用的空間，澳門人很多都是雙語、三語甚至四語的使用者，他們能夠使用多種語言。澳門的日常語言使用情況以及語言掌握情況充分反映了全球化對澳門的社會語言格局的影響。澳門回歸後，隨着澳門與中國內地和世界其他地區交流的日益增多，人員流動相當頻繁，故而可以在澳門聽到各種各樣的語言，見到使用多種語言的人。這都對澳門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提出了挑戰。

首先，如何處理中文和葡文的關係。一方面，澳門能夠使用葡語的人數較少，不利於維持葡文在澳門的正式語文地位，澳門政府和教育界仍然需要採取一些措施(包括語言教育政策)來維持葡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我們注意到近年來澳門高等院校組織各種葡語比賽活動，例如“葡萄牙語詩歌朗誦比賽”，“全澳葡萄牙語演講比賽”，“全澳大專院校英文及葡文寫作比賽”等等，“澳門理工學院葡語辯論比賽”以及葡萄牙語暑期課程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們學習葡萄牙語的熱情，但是如果僅僅從教育領域通過舉辦這些活動和比賽，顯然是不夠的。另一方面，由於澳門立法和司法部門仍然受到葡語的影響，影響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個十年發展路向選擇大型民意調查報告》對澳門一千多人的電話問卷調查顯示在問到“請問您認為未來十年澳門立法會有哪些方面需要改進”時，32.71%認為應該多用中文立法²⁰；在問到“在未來十年，請問

您對司法機關(包括檢察院及法院)的最大期望是甚麼”時，48.40%認為應該推動和落實法院在審判時使用中文²¹；在問到“請問您認為下一屆政府上任以後最需要優先處理哪些事情”時，35.90%認為應該推進法律改革，繼續落實中文正式語文地位。²² 這表明澳門政府需要加強雙語立法和司法，以保證中文的官方地位。

其次，是否需要明確規定英語在澳門的法律地位。澳門特別行政區《新控煙法》已於2012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根據這一規定，絕大部分的室內及公共場所將全面禁煙。與此同時，人們可以注意到在許多公共場所顯眼的位置上都張貼着禁煙標誌。根據《澳門基本法》第9條的規定，中文和葡文是澳門的正式語文，所以這兩種語言出現在禁煙標誌中不足為奇，但是除了這兩種語言之外，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英文也出現在禁煙標誌中。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沒有規定英語在澳門的官方地位，但是英語已經進入澳門社會的各個領域，似乎英語已經成為澳門的第三個正式語文。但是，最近澳門媒體上的一則新聞卻表明英語似乎尚未真正成為澳門的正式語文。《新報今日澳門》12月19日報道澳門一青年2010年在金沙酒店的一次派對時遇溺，因為搶救不及時，結果昏迷了一年，而家裏人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家屬稱，最近威尼斯人集團要求與家屬簽訂一份英文的保密協議，家屬認為這是不尊重澳門以葡文或中文為正式語文。這兩個例子表明英語在澳門的地位尷尬，一方面，特區政府充分意識到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的重要性，積極使用英語構建國際化大都市的形象；另一方面，由於英語在澳門沒有官方地位，其法律效力容易受到質疑。

第三，如何處理英語和葡萄牙語的關係。《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指出澳門今後十年非高等教育發展目標包括是學生中學畢業時必須具備熟練運用至少一種外語的能力。²³ 該目標雖然強調了外語能力的培養，並沒有明確指出“外語”是英語還是葡語。《澳門2020——未來20年遠景目標與發展策略》中明確提出：英語作為全球第一流通語言，對經貿交流與文化交流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突出地位。用英語交流溝通已成為國際化的重要標誌之一。過去澳葡時代，沒有條件全面加強英語訓練，但今後忽略英語就意味着失掉商機，沒有普遍的英語溝通環境，就不是國際化，應通過社會性的討論，令每個家庭都能全面提升對英語的認識與重視。當然，重視英語與適度發展葡語教育實質上並非絕對對立的事

物，但如果要在英葡兩種語言中取捨，應鼓勵首選英語。²⁴ 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具有廣泛的使用範圍，而葡萄牙語則是澳門的正式語文之一。將英語或者葡萄牙語作為第二語言，都會對澳門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將英語和葡萄牙語都確定為必修的第二語言，會加重澳門學生的學習負擔，效果可能適得其反。如果將英語定為必修的第二語言，而把葡萄牙語定為選修的第二語言，可能會進一步削弱葡萄牙語在澳門的地位。如果將葡萄牙語定為必修的第二語言，而把英語定為選修的第二語言，可能會招致許多澳門家長和學生的不滿和反對。此外，很多澳門學校效仿香港學校的做法，以英語作為一些課程的授課語言，但是由於許多研究表明母語教學的重要性，是將英語作為學科還是作為授課語言，需要慎重考慮。

第四，如何處理普通話和廣東話的關係，2010年“粵語保衛戰”令很多人擔憂廣東話今後的地位，一些學者從法律和語言學多個角度研究，認為不應該將普通話作為澳門正式中文口語。²⁵ 與此同時，由於許多新來澳門的內地人士不識廣東話，他們的子女在接受以廣東話為授課語言的教育時，可能會遇到各種問題，選擇普通話授課對於這些學生來說，可能是較為合適的。《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指出澳門今後十年非高等教育發展目標包括學生中學畢業時以中文為教學語文的學生能說比較流利的普通話²⁶，這一發展目標有利於普通話在澳門年青一代的普及，對於普通話作為學科(必修還是選修)還是授課語言，勢必會影響澳門未來的社會語言格局。

第五，澳門人口普查有關語言使用和語言能力的調查並沒有涉及澳門土生葡語。在過去近五百年的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中，澳門出現一個特殊的群體，澳門土生葡人，並見證了澳門土生葡語的誕生與瀕危。澳門土生葡人是葡萄牙人與南亞及東南亞國家、包括中國居民之間通婚而形成的。而土生葡語是以15-16世紀的葡語與馬來亞語、粵語和英語詞匯混合而成，它是19世紀以前土生族群內部交流所廣泛使用的一種語言。許多學者根據講某種語言的人的人數、年齡、下一代是否正在學習這種語言和這種語言在社區、社會的功能四個標準，對語言瀕危程度作出不同的分類。²⁷ 由於Fishman的分類較為常用，也較有影響力。我們主要參照他的分類來分析澳門土生葡語的現狀。Fishman按照“語言的功能”把語言的發展分為八個階段：第一階段：這種語言在教育、職業、政府和傳媒領域裏的高層使用(但是沒有政治獨立提供的

額外安全)。第二階段：這種語言在政府和大眾傳媒領域裏的低層使用，但是並沒有在這兩個領域的高層使用。第三階段：這種語言在工作領域的低層使用(在這種語言社區外)，講這種語言的人和另外一種語言的人之間交流時會用到這種語言。第四階段：在初等和中等教育裏，這種語言符合義務教育法律的規定。第五階段：在家庭、學校和社區裏使用這種語言，但是在社區外並沒有對這種語言能力的強制要求。第六階段：這種語言在兩代之間通過口語維持，並有人口和機構支持。第七階段：大多數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已經融入本地社會，而且民族語言認同強，但是都已經過了生育年齡。第八階段：大多數使用這種語言的人都是與社會相對隔絕的老人，這種語言需要從他們口中和記憶裏重建，並教給不住在一起的成年人。²⁸ 按照以上分類，澳門土生葡語已經處於Fishman所指的第八階段，即最後一個階段，即將消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9年將澳門土生葡語列為“嚴重瀕危”的語言。對於澳門土生葡語的消亡與保護，澳門人有一些看法。我們在2011年曾對澳門某高校的大學生對於澳門社會回歸以後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進行問卷調查，其中包括大學生對於保護澳門土生葡語所持的態度。從最終獲得的98份有效問卷來看，大學生傾向於同意“澳門政府應當採取措施保護澳門土生葡語”，對於“澳門土生葡人而不是澳門政府應該承擔保護澳門土生葡語的責任”這一問題，學生們基本上同意。換言之，澳門大學生認為澳門政府和澳門土生葡人都應該保護澳門土生葡語。我們注意到澳門土生葡人一直在採取各種措施保護澳門土生葡語。在2006年，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於2006年10月與六個葡人社團簽訂合作協議，打算把澳門土語申請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²⁹ 此外，澳門土生葡人社團組成多個藝術團體以便增加澳門人民對澳門土生葡語的瞭解與認識。例如上世紀90年代組建的土生土語話劇社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積極地上演澳門土生葡語的話劇。澳門著名的土生葡人樂隊“澳門人樂隊”在上世紀30年代組建，經常演唱自己創作的土生葡語歌曲。目前，澳門土生土與語話劇社申報的《澳門土生土語話劇》已經通過文化局澳門博物館2011年度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申報評審，建議列入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³⁰ 我們看到澳門政府和澳門土生葡人都在採取措施保護土生葡語。不過存在的問題是，這些措施使澳門土生葡語只能在藝術形式(如話劇、歌曲)中出現，而不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如果僅僅是一種表演性的語言，那麼

澳門土生葡語可能永遠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語言。它與人們日常生活越來越遠，將難以保證澳門土生葡語在澳門的生存與發展。

五、結語

本文主要使用澳門人口普查中有關日常常用語言和多語能力的數據進行分析，研究者需要充分認識到這種研究方法的利與弊。使用這種方法可以獲取大量代表性的數據，但是這種方法也有一些弊端。首先，這種方法假設澳門家庭內部只會使用一種語言，而沒有考慮到雙語家庭內部多種語言混用的現象，更無法考察雙語家庭內部語言維持和語言轉移現象。其次，關於多語能力的衡量。人口普查只是籠統地詢問參與者能使用幾種語言，由於時間和人力的限制，並

沒有對參與者進行實際的語言能力測試，因而我們不能確定得到的數據是否能夠真實反映受試者的多語能力。第三，問卷調查自身存在一些問題。³¹ 此外，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加快，我們需要對語言(包括其形式和功能)以及多語現象進行重新的認識³²，來解決語言多樣性和語言教育一致性之間的衝突，這都是我們在以後的研究中需要進一步討論和解決的問題。

澳門回歸十年來澳門的社會語言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都對澳門特別行政區對今後如何進行語言規劃和制定語言政策提出了許多挑戰，需要妥善處理各種關係，例如中文和葡文的關係，英語和葡語的關係，普通話和廣東話的關係。回歸十年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都沒有提出明確的語言教育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門社會語言格局的複雜性。希望澳門特區政府能夠妥善處理澳門的語言問題，制定合理的語言政策，以促進澳門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

註釋：

- ¹ 中外學者對於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具體年代和入居澳門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見金國平：《澳門源考》，載於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一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45-78頁。此外，中外學者對於澳門的殖民地地位以及澳門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的具體時間也有不同的看法，見 Fei, C.-K. (1996). *Macao 400 Years*. (Y.-T. Wang, Trans.). Shanghai: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黃鴻釗：《澳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Jesus, C. A. M. de (1984). *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等。本文遵循 Fei 和黃鴻釗的觀點，認為澳門直至 19 世紀中期才淪為葡萄牙殖民地，之前澳門是租借給葡萄牙。
- ² 在回歸之前，澳門的博彩業實行博彩專營權，由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簡稱澳娛)壟斷。2002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再發出博彩專營權，改為向三家公司發出博彩經營權牌照。
- ³ 統計暨普查局：《2011 人口普查詳細結果》，載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00c4fb20-1aac-4b19-b81b-be01e8660fba/C_CEN_PUB_2011_Y.aspx，第 9 頁，2012 年 4 月 17 日。
- ⁴ Nortier, J. (2008). Types and Sources of Bilingual Data. In W. Li and M. G. Moyer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Research Methods in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35-52.
- ⁵ 見 Bacon-Shone, J. and K. Bolton (1998). Charting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Censuses and Language Surveys in Hong Kong. In M. C. Pennington (Ed.), *Language in Hong Kong at Century's End*.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43-90; Bacon-Shone, J. and K. Bolton (2008). Bilingualism and Multilingualism in the HKSAR: Language Surveys and Hong Kong's Changing Linguistic Profile. In K. Bolton and H. Yang (Eds.).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5-51; 程祥徽：《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載於《語言文字應用》，第 1 期，2003 年，第 19-26 頁；劉鎮發、蘇詠昌：《從方言雜處到廣府話為主：1949-1971 年間香港社會語言轉用的初步探討》，載於《中國社會語言學》，第 1 期，2005 年，第 89-104 頁。
- ⁶ 統計暨普查局：《常見問題》，載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http://censos.dsec.gov.mo/FAQ.aspx>，2012 年 4 月 17 日。
- ⁷ 同註 3。
- ⁸ 閻喜：《普通話在澳門：歷史與現狀》，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 10 期，2011 年，第 167-168 頁。

- ⁹ Shan, P. W. J. and S. S. L. Ieong. (2008). Post-colonial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cau. *Comparative Education Bulletin*. 11, 37-68.
- ¹⁰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澳門：澳門出版協會，2007年，第9-37頁。
- ¹¹ Harrison, G. J. (1984). The Place of English in Macau and a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5/6, 475-489.
- ¹² Mann, C. and Wong, G. (1999).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ducation: A Survey from Macau on it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3/1, 17-36.
- ¹³ Young, M. Y. C. (2006). Macau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A Post-1999 Survey. *World Englishes*. 25/3-4, 479-490.
- ¹⁴ Moody, A. (2008). Macau English: Status, Functions and Forms: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a Small Community of English Users. *English Today*, 24/3, 4-5.
- ¹⁵ 《調查報告指：澳門會展業增速躋身亞洲三強》，載於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gangao/2009-07/08/content_11673259.htm，2012年4月17日。
- ¹⁶ 統計暨普查局，《教育調查 2010/2011》，載於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http://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1073d393-c2a5-44be-9327-6e48f62b69ab/C_EDU_PUB_2011_Y.aspx，第69頁，2012年4月17日。
- ¹⁷ Moody, A. (2008). Macau English: Status, Functions and Forms: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a Small Community of English Users. *English Today*, 24/3, 6-7.
- ¹⁸ Ibid., 3-15. Young, M.-Y. C. (2007). English in Post-colonial Macau: Functions and Attitudes. *Asian Englishes*. 10/1, 104-117. Young, M.-Y. C. (2011). English Use and Education in Macao. In A.W. Feng (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across Greater China*.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114-130.
- ¹⁹ 有關澳門其他中國方言向廣東話轉移的研究並不多見。
- ²⁰ 《“一國兩制”研究》編輯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二個十年發展路向選擇大型民意調查報告》，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3期，2010年，第105-117頁。
- ²¹ 同上註。
- ²² 同上註。
- ²³ 《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載於澳門教育暨青年局，<http://www.dsej.gov.mo/~webdsej/www/dsejnews/eduplan/c/02.html>，2012年4月17日。
- ²⁴ 楊允中：《澳門2020——未來20年遠景目標與發展策略》，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經濟學會，2000年，第31頁。
- ²⁵ 梁淑雯：《淺談“一國兩制”下澳門的語言發展》，載於《“一國兩制”研究》，第8期，2011年，第138-140頁。
- ²⁶ 同註23。
- ²⁷ Bamgbose, A. (1993). Deprived, Endangered, and Dying Languages. *Diogenes* 41/161, 19-25. Krauss, M. E.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1, 4-10. Krauss, M. E. (1997).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the North: A Report on Their Present State. In H. Shoji and J. Janhunen (Eds.), *Northern Minority Languages: Problems of Survival*. Osaka, Japan: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34. Dixon, R. M. W. (1991). The Endangered Languages of Australia, Indonesia and Oceania. In Robert H. Robins and Eugenius M. Uhlenbeck (Eds.), *Endangered Languages*.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29-255. Kibrik, A. E. and A. Eulenberg (1991). The Problem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in the USSR. *Diogenes*. 39 /153, 67-83.
- ²⁸ Fishman, J.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87-109.
- ²⁹ 見“澳門”條目於維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E%B3%E9%96%80#cite_note-61，2012年4月17日。
- ³⁰ 《四項申報澳門非遺項目，二月十日起進行公示期》，載於澳門博物館網站：<http://www.macaumuseum.gov.mo/w3MMnews/NewsC.aspx?newsId=156>，2012年4月17日。
- ³¹ Dornyei, Z. and T. Taguchi (2010). *Questionnaire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rocessing*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6-9.

- ³² Aronin, L. and D. Singleton (2008). Multilingualism as a New Linguistic Dispensatio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5/1, 1-16.
Blommaert, J.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nnycook, A. (2010). *Language as a Local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Stroud, C. and K. Heugh (2011). Language in Education. In R. Mesthrie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3-429.